

「李天纲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同东西

刚刚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通讯网H-Asia上下来。昨日，加拿大约克大学的退休教授陈志让先生在网上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客人老是抱怨美国主人不够热情？中国人对外国人多少客气。到了国外，主人却不陪玩不陪饭，一切都要自己来。问题是关于美国人的Coolies，不是当下孩子们流行讲的「酷」，而是『冷漠』和『冷淡』的意思。提法平常，反应却很热烈。贴版上一时蛮闹猛。这真是一个老问题。陈志让是我们唐振常先生的四川同乡和燕京同学，在外五十多年，现在是最重要的中国学家之一。他的军绅政面和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文化有透彻的了解。或许也真是国外住惯了，初到国外的新鲜感早已消失，才会不得其解地这样问。作为两代中国人，我们和陈先生隔着一个悬殊的政治时代，却带着一个广阔的文化时代。我们都是在中国文化的沦落时代，在外飘荡的人。谈论这类问题时，我们就像是同代人。发生代沟。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始终横陈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不能回避，容不得退缩。躲在中国文



九歌文丛

心同东西

李天纲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同东西/李天纲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
(九歌文丛)

ISBN 7-5617-2399-7

I. 心... II. 李...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181 号

九歌文丛

心同东西

著 者 李天纲

组 稿 陈丽菲

责任编辑 叶志方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 021-62571961

传真 021-62860410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译文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6.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7-5617-2399-7 / I · 244

定 价 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代序

刚刚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通讯网 H-Asia 上下来。昨日,加拿大约克大学的退休教授陈志让(Jerome Chen)先生在网上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客人老是抱怨美国主人不够热情?中国人对外国人多少客气。到了国外,主人却不陪玩,不陪饭,一切都要自己来。问题是关于美国人的“Coolness”,不是当下孩子们流行讲的“酷”,而是“冷漠”和“冷淡”的意思。提法平常,反应却很热烈。贴版上一时蛮闹猛。

这真是一个老问题。陈志让是我们唐振常先生的四川同乡和燕京同学,在外五十多年,现在是最重要的中国学家之一。他的《军绅政权》和毛泽东研究是我们大学学历史时喜欢和佩服的。间接地得到很多他的消息,这么多年,却始终缘慳一面。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文化有透彻的了解。或许也真是国外住惯了,初到国外的新鲜感受早已消失,他才会不得其解地这样问。

作为两代中国人,我们和陈先生隔着一个悬殊的政治时代,却共有着一个广阔的文化时代。我们都是在中国文化的沦落时代,在外飘荡的人。谈论这类问题时,我们就像是同代人,没有代沟。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始终横陈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不能回避,容不得退缩。躲在中国文化的保护伞下,我们还可以自我陶醉,自得其乐,相濡以沫。这顶伞有点破,但够大,总还

有几块凉快的地方可以腾挪。可是，一旦踏出国门，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别样的人群，别样的习惯，别样的思想。二十年前，在大学念本科时，和美国 Roommate 孟大卫在留学生楼一室同处了两年，开始讨论这样的异同。十年前，到美国的旧金山大学进修学业一年多，更是直接陷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以后又因为研究和会议，多次长长补短地到欧美访问。人世间的各种“差异”，每每要遇见，有时会碰得很痛。一次次地误解、了解和理解，才慢慢体会到：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对错、好坏，大多数只是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而已。在这种问题上，你根本不可能说服别人，或者被别人说服。总要等你体会了，理解了，你方能释放你的尴尬和不适，别人也一样。

“寻求理解”的能力，窄而言之是个人素养决定的，广而言之就是民族文化的性格控制的。历史学家的工作，通常是在文化层面上进行的。历史学常常要用诸如“精神文明”、“天人合一”、“仁义道德”等概念术语来作理性的分析，沟通双方。但是这不等于学者可以忽视个人经验和生活现象，凭空结撰体系，虚构历史。这样没法沟通。一旦遇到了具体的个人交往和实在的外交冲突，我们就会像清末颤颤的理学家们一样，陷入自说自话、不通中西的僵局中。

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要注重经验，关怀人心。已经有很多人说过：没有经验的历史，是假的；没有人心的文化，是死的。时下的很多论文、论著，讨论的问题，从观念到观念；谈论的历史，抄死人抄活人。我们的意识形态习惯，还是庄重建立一个框架。我们的教育传统，还在灌输和背诵思想条文。“个人经验”和“宏大叙事”之间如此地缺乏有效的沟通，这样就有人偏执一端：要么吹嘘自己的“宏大”，到了不可捉摸程度；要么自我作践，自说渺小，目的还是放大自己，冒充崇高。

讲到这里，可以交代本书成立的初衷了。收入本书的，大多是几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散乱文章。有的是学术杂志，有的是一般报刊。文章是被朋友们约稿，一篇篇陆续写成的，但主题倒似乎可以归为一个：“心同东西”。拿了这句话作本书的书名，是借字于陆九渊

的名言：“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这也是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信念。东方和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当然很大，但是，应该相信：中国人、外国人，人性中的许多方面却是相通的，中国的国情、民情、人情，没有政治家们夸张得那么特殊。如果我们能够透过文化的表象，破解人性，沟通双方，我们真的会有许多身心的愉悦。这么多年来，很多开放之初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忙于考托福、GRE，缺乏文化的准备，生活积累不够，到国外后，马上陷入中西文化的冲突漩涡中，不能自拔。爱荷华大学的原科大学生卢刚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所有的出国人群，多多少少都生活在孤独之中，这虽然是所有离开了自己文化传统的外国移民的共同问题，但对于中国文化中人来说，它更加严重。

因为这样的痛苦，我们需要在文化层面作沟通。欧美学术之所以能理解人，能被人理解，在于他们的学者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常有佳构。很少看到对具体问题毫无说服力的作品能够出版，这是经验主义学术的起码要求。学者既应在历史中作理性思考，也应在现实中过具体的生活。对学者来说，这两者并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陈先生如此高龄，还在网上谈论现实，触摸具体。对于需要保持思想活力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生活思考，是和语言训练、史料阅读、观念分析同等重要的工作。西方大部分学者，在历史与现实、学术与生活之间，没有我们这样大的障碍。通观的历史，活在所有人的生活中。

正是以上的想法，触动了写出本书收录的这么些看似多余的文字。何尝不知，自己谋职的历史学领域，有太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应该加紧从事才是。但这里的感受很急迫，倘按了现在学术界的范文格式，写成论文就不知要多隔几层。这样，不小心也介入到当下的所谓的“学者散文”写作中来了。除了确实有点想通过比较感性的写作，化解枯燥的历史，向更多的读者推销这一日趋冷落的学科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想关心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我们因为跨东西方生活而生出的共同命运。

收进本书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巴黎的。这是自己逗留时间较短的城市，本来不便多写。砖块一样的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已经把这

个世界的“文化首都”堆砌得无以复加了。但是，仍然不能免俗地感到，这确实是自己最喜欢的城市。这个城市，是多么地能够容纳别样的文化，至今还有这么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创造活力。应该承认，美国是最能够容纳移民的国度，但是按自己和很多人的体会说：二百年来的全世界，最能够容纳外来艺术、思想和文化的城市，第一是巴黎，第二才是纽约，第三或许就是那曾经一度的老上海。完全不能遏制在自己文章中把这三种文化作对比的冲动。只是管窥蠡测，散乱跨越，不副读者的鉴赏。

巴黎的愉快，还在于人们的友善。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王菊，十年辛苦，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因为王菊和白吉尔、让托教授的努力推介，才有了巴黎之行。在巴黎期间，幸运地碰到许多同学。他们有的是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有的是来过上海的外国留学生。老友旧识，在异国相聚，马上有了社群感。巴黎就是这样一个奇妙而好客的城市，人际交往密切，沙龙气犹存，让短期的客人也能有所归属。王菊、萧小红、罗萨德、葛力、詹嘉玲、沈德元、茅青、张宁等等，每到周末，同龄的中外朋友或聚在一起，或开车出游。借助他们多年的经验，我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巴黎。没有他们分享给我的人生体验，本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是无以成文的，读者自然可以看出这一点。为此，要感谢巴黎的朋友们。特别应该感谢的是王菊。去年王菊和我们另一群在美国的同学，又一同聚在哈佛大学。听了很多故事后，老同学们都认真地说，每个人都应该写一本“海外读书记”。真希望由巴黎、波士顿、纽约、普林斯顿、斯坦福的同学们来写他们的十年甘苦。那一天，像现在这样《心同东西》之类的东西，就可以被忘记了。

写完以上文字的时候，打开电脑，陈志让先生的问题，还在网上讨论。一位在西安教书的美国教师 Ann 在作自我批评。她说：中国人总是善意地认为，外国客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主人应该帮助他们。美国人确实缺少这种精神。另一位熟人，经常在网上发言的澳大利亚拉托布大学白慕堂教授，说：东西方文化的这个差别在语源学

上。印欧语系的语言中,Host 与 Guest 是同源的两个字,不分彼此的。中文里“主”和“客”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字。所以,美国人不会客气,中国人太会客气。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有没有理由,能不能服人。反正,历史学家应该给大家有所解释,文化才会因此而丰富,对话也会因此而便当。

李天纲

2000 年 4 月

目 录

代序

法兰西精神殿堂

- 3 / 国家图书馆:西方汉学重镇
- 14 / 皇港修道院:“废墟”中的思想
- 26 / 尚蒂依城堡:半部法国史
- 32 / 夏特勒教堂:从教权到人权
- 38 / 巴黎先贤祠:法兰西精神殿堂
- 44 / 拉雪兹公墓:异国灵魂栖所
- 48 / 勒玛黑地区:老城的气派

塞纳河通苏州河

- 55 / 塞纳河通苏州河
- 61 / 速度与传统
- 66 / 上海人在巴黎
- 71 / 博物馆的真谛
- 77 / 法国人的架子
- 84 / 诺曼底的云

心同东西

- 91 / 东海西海 心同理同
- 100 / “虚拟”很实在

- 104 / “中国人现在不写信”
112 / 非暴力的民主
119 / 笑话战争
124 / 另一种美国梦
130 / 中国文化的知己谢和耐

欧楷珍录

- 153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徐光启佚作《造物主垂
象略说》
164 / 《同人公简》：见证“中国礼仪之争”
185 / 罗马档案：马相伯为何出走徐家汇

后记

法
兰
西
精
神
殿
堂



原书空白页

国家图书馆：西方汉学重镇

法国国家图书馆。虽然现代的巴黎人读书风气比过去淡了，但它仍然是法国文化的骄傲。书历来是法国人的所爱。巴黎的路边，常常看到，出租车排队等客人的时候，司机们都在看书，且不论他们看的是什么书。拉丁区的书店、咖啡馆（很多人在书店买完书后，就在咖啡馆里读了起来。咖啡馆是拉丁区读书生活的附庸）在法国当代文化生活中仍然充当了重要角色。当1977年蓬皮杜文化和国家艺术中心落成的时候，大厦的整个二、三楼设立了一个庞大的“公共资讯图书馆”。所有市民都可以使用。虽然是非常的大众化，但它的藏书也十分专业，足够作博士论文使用，很多巴黎大学的学生在这个图书馆里做论文。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图书馆坐落在三区，离地铁交换中心夏特莱很近。

很多有关公共福利事务的决定，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公布的。1988年7月14日，有知识分子情结的密特朗总统决定建造国家图书馆新馆。历时8年筹备，1996年，在十三区车站码头附近的塞纳河边上，建成了当今世界上最恢宏的图书馆。因靠近陶勒比亚克路(Rue de Tolbiac)，故称“陶勒比亚克新馆”。

据介绍，陶勒比亚克新馆收藏有1200万册书籍。有11层楼面的藏书架，架子长度总和为240公里。新馆作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总部，很多历来为法国帝王骄傲的传世藏品，都作为镇库之宝，移到新址。如欧洲最早的活字印刷书：1456年的古登堡《圣经》(Guternberg Bible)，以及法国诗人维永(Francois Villon, 1431—1463?)、文学家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哲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初版本著作，都移到了新馆。欧洲的印刷术

晚于中国,这些 15 世纪的书籍,就是他们的最古的古籍了。书籍之外,新馆还移入了全部的雕版刻印作品有 1 200 万之巨。另外还有 200 万张照片。这两项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收藏。再有就是很多手稿:从“死海古卷”,到查理曼大帝的传道书,再到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普罗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的手稿,居里夫人的信件……

从许多历史学前辈们,像陈寅恪、王重民、冯承钧、向达等人著作的注脚里,知道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价值。刚到巴黎,怀疑地打听这些中文藏书的下落。朋友们都吃不准地回答:法国人官僚得很,不知这些中文古籍是在老馆,还是也移到了陶勒比亚克新馆,或者因为搬迁而暂时不开放。最好是先到旧馆问一下。想想也是,离开上海时,上海图书馆就因为新馆搬迁,徐家汇藏书楼的所有特藏品全部不开放了,弄得许多海外专程而来的访书者住在宾馆里长吁短叹,徒唤奈何。好在就住在拉丁区,离旧馆不远。按地铁图,很容易到达。旧馆现在称为“黎塞留分部”,因为该馆在黎塞留路(Rue de Richelieu)58 号,就在巴黎市中心二区。问过之后,欣喜地被告知:国家图书馆的东方文献收藏不受搬迁工作的影响,仍然在,而且今后也不会挪动。虽说法国人官僚,其实只要他们认真办,还是非常有规矩,有效率。有邀请人巴黎三大教授之一白吉尔夫人的介绍信(一样要介绍信,不过是以个人的名义),付了很少的登记费,拍照,做临时阅览卡,一个小时就办好了一切手续,可以入室阅读了。

管理汉语古籍的中文处在图书馆的东北角,三楼。在汉学家眼中,这是一座学术殿堂,马上感受得到传统的魅力。整个图书馆,在法国大革命前,是路易家族的“皇家图书馆”。管理员捧出的图书上,都镌有“Bibliothèque Royal”的印记。阅览室是专门的藏书楼设计。内厅有二三三百平方米,十几米高,穹隆顶之下十分高敞。腰部隔出环型的断层。下层阅览,有盘旋楼梯通往上层,上层是书架藏书。书桌用羊皮包裹,抄书架上也贴了羊皮,以防书籍磨损。这是非常有名的阅览室。中国读者大多是在留学欧洲的学者作品中知道法国国家图

书馆的。文史哲学生都知道的伯希和“敦煌文献”就藏于该馆。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讽刺中国学者，拿了庚款到欧洲留学，不学数理化，不学外国文学，倒是穷抄中文的敦煌卷子。抄卷子的地方，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珍本部东方室”。



藏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中文敦煌古卷

“珍本部”相当于国内图书馆的“特藏部”、“善本书库”。所谓“珍本部东方室”，除了收藏中国、日本所谓“远东”国家作品外，还收藏希腊、土耳其、阿拉伯、印度的手稿。“东方室”起源于更早时期收藏近东地区的作品。如我们知道，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开始向东方寻找知识，大量的外来文化，以希腊、罗马古学的名义，从东方输入欧洲。早期人文主义大师，如伊拉斯谟等人，提倡“三语教育”，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在欧洲一度是最高深的学问。现在法国的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最初的名称就是“三语学院”，1530年由法朗索瓦一

世创立。懂得这些文字的学者,以及擅长这些文字书法的“抄书手”,被教皇、主教、国王和贵族请到自己的私人图书馆校书、抄书。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讲到图书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地位。皇帝好书,其情景很有些像清代康熙、乾隆的宫中编印、刊刻古书,学习“泰西”的地理、天文学说一样。在欧洲历史上,“东方”(Oriental)最早是指“三语”流行的近东地区。“珍本部东方室”,法语是 *Department des Manuscrits, Division Orientale*。随着欧洲学术的发展,如今“三语”已不希罕,更难掌握的是远东民族的语言文化。“东方”概念越走越远,扩大到了太平洋国家。在“东方室”中,有阿拉伯文手稿,其中 1 515 份来自德·谢维勒(Asselin de Cherville)的收藏,791 份来自煦福(Schefer)的收藏。其他还有越南、日本、韩国、墨西哥、埃塞俄比亚等文字的文献。但是,该部的看家书种却是中文书。

中古的中国,是世界上出书最多的国家。16 世纪有少量的中国图书经葡萄牙商人转运到欧洲。当时中文书的纸质、印刷、装订和书法,都为欧洲人所欣赏,各国君主以家中有几部中文书为荣。里斯本和罗马的图书馆得中国的风气之先,有不少线装书。法国后起,全国只有权相马(Mazarin)家里的“马札然文库”中有三部中文书,“太阳王”路易十四非常妒忌。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耶稣会士去中国传教,从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获取包括书籍在内的中国文化,以和各国附庸风雅的君主争一高低。1697 年,路易十四派出的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用奎宁丸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康熙感激,要他回国多招弟兄前来。在他亲自备置的礼物中,就有 49 部中文书。路易十四得到这些中文书后,卢浮宫曾为之轰动。直到现在,欧美各大图书馆,没有中文古籍,就不能称为是一个好的图书馆。

各国图书馆中文书库大,是不奇怪的。但法国国家图书馆有这么多中文书,应归功于大名鼎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1910 年,伯希和从中国带回了 3 000 页的手抄文献,2 000 本共 30 000 卷的中文书籍。中文收藏中,最珍贵的当然是敦煌文献。

这些文献,是在商务、中华等书局大量印制近代平装本(所谓“洋装书”)之前收集的,均属古籍。伯希和在晚清的混乱中,从中国西北和帝都北京觅到的书籍,有许多是宋、明、清的刻本。这些中文书的收藏在欧洲堪称第一,是“东方室中文处”的主要收藏,历来是欧洲中国学者在中国之外研究中国的必到之处。雷慕沙、儒莲、高第、戴密微等著名汉学家曾负责东方室这个部门。几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博士、教授在这里“皓首穷经”,孜孜于中国文化。

“敦煌文献”,是中国的损失,是法国的获得。伯希和对他自己国家图书馆的贡献,只有到阅览室里看过才能体会到。伯希和收集的书运到了以后,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定了他们的中文藏书目录。16开,像老《辞海》那么厚三大本,称为“库朗目录”(Catalogue de Courant)。其中敦煌文献和其他佛经、道藏竟占了专门一大本。另外较小的两本,一是一般古籍,二是和耶稣会士有关的明清天主教徒的中文著述。有这些藏书,加上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在伯希和之后的一批杰出的敦煌学者,国际汉学界就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巴黎。”“在巴黎”,就在这“珍本部东方室中文处”。对于这样的说法,中国学者在几十年内不得不承认,也有引以为是中国的耻辱。现在看来,这些文献,放在混乱的20世纪中国,未必能躲过各种灾难。同时,法国学者真正重视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斯坦因弄到伦敦大英博物馆的英藏敦煌文献主要是被看作值钱的文物古董,没有好的研究。有伯希和这样的学者研究,敦煌文献转移他邦,也不算是明珠暗投。

现在交通和科技发达,敦煌文献已经不为巴黎国家图书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所垄断。当代各国的敦煌学者,早已有缩微胶卷可用,大可不必如陈寅恪、冯承均、王重民、向达等前辈,终日埋首在室中抄写卷子。据东方室中文处主任蒙曦(Nathalie Monnet)女士说,他们已经应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要求,将所藏的全部敦煌卷子,合作在上海影印出版。在敦煌文献回归中国之前,有这样的出版举动,也是学者们的大好消息了。近十年的中国出版界努力开放,实力增强,有此豪